

# 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的转型模式

张 宇

**内容提要** 论文首先回顾和总结了过渡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并把过渡经济学理论概括为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演进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和新左派等不同的范式；其次分析了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宪法制度的选择、市场经济的含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演进主义与建构主义、局部整体与次序、民主化与市场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文化的意义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和经验；最后，讨论了过渡经济学的意义、局限和前景，并对经济转型后期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进行了展望。

**作 者** 张 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一、过渡经济学的发展轨迹

### （一）从改革经济学到过渡经济学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思想虽然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改革实践也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南斯拉夫探索自治社会主义起就开始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过渡经济学却只有十多年的历史。90 年代以前的改革与 90 年代以后的过渡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实践上看，90 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中进行的，而在 90 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被否定了，宪法制度的改革演变成了宪法制度的“革命”。从理论上讲，90 年代以前的改革是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探索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商品关系的兼容性，而在 90 年代以后，过渡经济学被纳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1989 年，在苏东剧变前夕，匈牙利经济学家 Kovacs 在一篇名为“改革经济学思路的演进与分类”的论文中，

曾这样预言了改革经济学的灰暗命运 (Kovacs, 1989), 他说:

“在东欧, 新自由主义正在给改革思想掘墓, 有人说, ‘你过去想构造一本跟得上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革概念的分类学, 现在你应该为改革思维作为一个总体写个讣告’。自由主义思维在东欧的再现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使 ‘什么是改革经济学’ 和 ‘如何比较不同的改革概念’ 之类的问题变得过时。”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苏联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纷纷陷入困境,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增长, 随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激进式改革的大规模实施, 苏联东欧的改革理论全面转向, 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转变成为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改革经济学转变成成为过渡经济学。

## (二) 转型出人意料

在苏东剧变刚发生时, 在正统经济学家中间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 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实行以宏观经济的稳定化、价格的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为核心的激进式改革, 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 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但是, 实践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对于激进式改革的乐观预期很快就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而被悲观的情绪所代替, 波兰学者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的观点代表了这种认识:

“东欧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过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引发了灾难。灾难一开始就以真正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形式表现出来, 其破坏程度之强为当代历史所仅见。之后, 这场灾难又表现为自毁自灭, 几乎分文不取地将自己的大部分国有固定财产出让给外国人。”<sup>①</sup>

经济转型的结果在许多方面出人意料: 经济学家事先没有预料到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私有化的结果导致了 “内部人” 获益; 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引人瞩目地增长, 俄罗斯的所谓 “黑手党” 现象严重; 如此之多的国家分崩离析; 最大的正面意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所有这些出乎意料都表明经济学家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转型的任务, 人们有关转型的知识和对转型的理解相当有限, 并且大部分是 “事后诸葛亮” (热若尔·罗兰, 2002)。虽然推崇激进式改革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理由来为原苏联东欧经济转型的恶劣绩效辩护, 比如改革的绩效取决于改革的初始条件而与改革的政策和路径无关, 宪政规则的彻底改变所造成的短期内的负面效应会带来长期的繁荣, 就像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带来法国的强盛一样, 等等 (杰弗里·萨克斯, 胡永泰, 杨小凯, 2002)。然而, 正如凯恩斯所说, 从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讲求实际的经济学家们绝不会满足于百年的等待。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原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00 年独联体国家的 GDP 仅相当于 1990 年的 62.7%, 而到 2002 年中国的 GDP 相当于 1978 年的 8.6 倍<sup>②</sup>, 1991—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 10.4%, 增长了近 1 倍, 而俄罗斯则减少了近一半。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 成功与失败的差别是如

<sup>①</sup> 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 1 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sup>②</sup> 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 9 页,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不试图从中汲取一些教训，那未免也太不负责任了（斯蒂格利茨，2000）。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代之而起的是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关注。<sup>①</sup>

从最初对渐进式改革的否定，到逐步承认其合理性，进而使肯定性意见成为主流，最后导致“北京共识”的出现，理论观点的这种巨大转变根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20 多年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经济转型的丰富实践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深刻反思。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结构、机理以及经济转型中市场的作用、政府的地位、国有企业的前途和宏观政策的目标等基本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于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绩效和经验也有着不同的判断，由此形成了过渡经济学的若干不同范式。

### （三）范式的多元化

作为经济学中一个分支，过渡经济学的基本倾向也可以简单划分为新自由主义、非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各种中间形式，但是这种简单划分并不能全面和准确了解过渡经济学的复杂内容。从具体的理论模式看，过渡经济学的范式呈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1. 新古典经济学。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过渡经济理论和政策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sup>②</sup> 华盛顿共识坚信自由市场的有效性，认为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全面快速的改革战略，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慢步行走，摸着石头过河，最终一事无成。那么，为什么激进式改革优于渐进式改革呢？“大爆炸”理论的倡导者给出了如下理由：经济体制中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因而，部分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必须取消行政干预；只有全面快速的改革才能使新制度的受益者在力量对比上获得优势，减少改革的阻力；政府必须尽快控制通货膨胀以取信于民；局部改革虽然能持续推进，但它同时会保留旧制度的残余；只有明确迅速地建立新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经济的混乱、人为的干扰和体制复归；新政府必须充分利用大选得胜后

<sup>①</sup> 2004 年 5 月，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肯定了中国 20 多年来改革和发展的成就，而且把中国的经验当做正在深刻改变国际格局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一个典范，对于“北京共识”的内涵，他作了这样的概括：“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了一系列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和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变化如此之快，以致于没有多少人，甚至是本国人都赶不上形势的社会的产物，它也是由这样一个社会决定的。”（参见“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peer.org>，2005-01-22）

<sup>②</sup> “华盛顿共识”最初是由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于 1989 年总结出来的。它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财政部）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用于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一系列政策的总结，它的核心是“小政府、大市场”，快速地私有化和自由化。这些政策后来被广泛运用于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

的“蜜月期”来加快改革。<sup>①</sup>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观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金融组织的大力推广和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的强势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转型国家的实际政策,并形成了激进式改革的理论基础。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一理论所推崇的激进式改革的绩效令人们大失所望,另一方面,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市场发展的理论,它抽象掉了时间、制度以及政治和文化等重要因素的作用,因而无法对制度变迁的复杂过程作出系统解释。于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型理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众多的批评,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影响逐步扩大,在过渡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领域内,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模糊不清,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战国时代”。

2. 凯恩斯主义。<sup>②</sup> 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完全且代价很高的信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不完全的竞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完全竞争范式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转型经济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过分依赖于经济学教科书的模型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的模型是苏联东欧改革陷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Joseph E. Stiglitz, 1994)。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既根源于冷战所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经济转型的实践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同时呼唤着一种新发展观。新的发展观认为,促进发展需要更广的目标和更多的手段,人们的目光不能只盯住 GDP 数值,而应当追求民主、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市场的有效运转不仅需要自由化、稳定化和减少政府干预,而且需要健全的金融规制、有效的竞争政策、促进技术的转化和鼓励透明化、维护社会组织并提高社会资本;发展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着眼于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必须包括公共部门、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发展问题,等等,这种新的发展观就是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 (Joseph E. Stiglitz, 1998)。马克·奈尔等以后凯恩斯主义者理论为基础,批评了激进式改革对于自由市场的盲目崇拜,他们认为,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忽视了这样一些重要事实: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不仅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资源的一种手段,它同时还具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生产等重要功能;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在适当的环境下,国有企业也可以对市场做出积极反应;货币供给是金融制度的内生变量,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受着严格的限制 (Mark Knell and Christine Rider, 1992)。阿姆斯特丹和泰勒等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更多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手”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的成功有赖于能够支持长期投资和承担风险的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建设,包括建立明确的产权和契约法律,创建能够执行宏观政策以及贸易、竞争、技术与工业政策的私人及公共组织等,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建立,东欧建设的是“假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假资本主义”,是因为保证资本长期积累的核心制度很少引进 (Allce H. Amsden, Jacek Kochan-

① Ian Jeffries, *Socialist Economics and 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London and New York Press, 1992.

② 这里所说的凯恩斯主义是从理论和观点的角度加以界定的,至于某个学者是否严格地归属于凯恩斯学派的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对其他观点的归纳也是如此。



owicz and Lance Taylor, 1994)。彼德·诺兰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的不确定环境下,私人行为更倾向于短期化,市场失败的范围更大,强有力的政府的干预是解决市场失败、顺利推进经济转型过程的有效手段(Peter Nolan, 1995)。

3. 演进主义。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激进式改革的挫折为演进主义提供了有利的事实根据,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的逐步扩大也是过渡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演进主义理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演化经济学、保守主义政治学和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其基本思想是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社会是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主张局部的渐进式的改革,反对全面大规模的社会变革。麦克米伦和诺顿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缺乏效率,在于计划者不能获得充分而准确的必要信息,而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决策所必要的信息都集中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据一个预定的时间表进行一揽子改革时设计人和执行人同样面临信息不足的难题。彼德·蒙勒认为,激进改革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它设计了一个理想的配置体制,希望将其一步到位;渐进改革观则把社会看成是一种信息加工手段,认为社会的信息量有一个累积过程,任何改革方案最初都是以旧体制下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对于未来,改革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M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Peter Murrell, 1994)。青木昌颜等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进化系统,其内部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互补性越强,改革的成本越高。同时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时,即使总的方向已经确定,改革的结果和过程也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制度发展过程中还必然会产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给体制改革的推进带来政治上的困难,因此,渐进式改革方式更为可取(青木昌颜等, 1999)。Gernot Grabber 和 David Stark 认为,从进化论观点看,没有多样性,就没有选择,制度和组织的快速变化,往往会牺牲长期效率。相反,旧体制的存在,制度变迁中的摩擦,会保留制度的多样性,为新制度的选择和产生提供广泛的空间,从而促进制度的成长(Gernot Grabber and David Stark, 1998)。王辉认为,要使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高度专门化的物质资产、制度资产特别是人力资产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并提高它们的潜在价值,这需要实践和时间。没有这种恰当的转化和再升值,实行市场经济时各种资产必然会发生贬值,造成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渐进转轨的主要根据(王辉, 1998)。

4. 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市场”中,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成功的结果。随着合同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律与经济学、规制理论、公司财务以及应用经济理论及其他领域的发展,重点向制度学派观点的转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着”(热若尔·罗兰, 1994)。过渡经济学的兴盛在中国经济学界表现尤为明显。20 世纪 80 年代,比较经济体制学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90 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中最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的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合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运用;交易费用、产权明晰化、路径依赖、制度成本、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结构等新

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广泛流行;关于制度或体制改革的文献如雨后春笋,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迅速扩大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向。<sup>①</sup>

在过渡经济学领域,与制度经济学一起走红的还有新政治经济学,所谓改革过程的公共选择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sup>②</sup> 科尔奈的话说得明白:“解决经济问题一个基本条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不得不强调,首要的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Kornai, 1995)。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的有效运转依赖于能促进自由交易的制度结构和能适应并按照市场理念行动的个人,而这些制度结构和具有市场理念的个人又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在没有历史、没有制度结构和没有市场理念的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想法,是一种天真的想法。那些建议市场黑箱总是有效率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市场转型的困难 (James M. Buchanan, 1997)。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的观点更具代表性,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只有宪政制度的转轨才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最终标志,而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则只是转轨的一个部分(杰弗里·萨克斯等, 2002)。过渡经济学中许多文献的名称也很能说明问题,例如:《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樊纲, 1997)、《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胡汝银, 1994)、《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James M. Buchanan, 1997)、《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张宇, 2001)、《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格泽戈尔兹·科勒德克, 2000)、《改革的政治经济学》(Fedrico Sturzenegger, Mqriano Tommasi, 1998)、《理论化的过渡:后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Adrian Smith and John Pickes, 1998)。

5. 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庞杂,流派众多,但是它们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机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市场机制可以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按照罗默等人的概括,迄今为止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已经经历了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第一个阶段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不能使用自然单位,而必须求助于某种价值符号;第二个阶段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通过计算方程式来达到一般均衡;第三阶段提出了用竞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产生了兰格—泰勒—勒纳模式(简称兰格模式);第四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奥塔·锡克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协调下的自由市场模式等重要的改革思想;苏联东欧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五个发展阶段,产生了所谓的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是:公有制(主要是指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追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平等,使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结合起来。从这一认识出发,第五

① 下面的例子很说明问题,即在盛洪主编的国内第一本过渡经济学的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中,几乎所有的文献都是以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为基础。

② 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公共决策的经济学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与传统政治经济学含义不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一概念。

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企业制度、政治体制以及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 (John E. Romer, 1994)。<sup>①</sup>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苏东剧变之后,以科尔奈为代表的东欧新自由主义者明确宣称,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Kornai, 1995)。但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逻辑。1984 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框架内进行的,1985 年以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1992 年中共十六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7 年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成了从反市场向亲市场的转变,市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但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姻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

6. 新左派观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贫富分化、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对于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知识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即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新左派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贫富分化、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方面的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是由政府干预和国有体制广泛存在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行彻底的市場化和自由化路线,尽快确立私有产权的主体地位,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新左派持坚决批判的态度。新左派的主要观点是:(1)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 these 问题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自由主义要对它导致的市场垄断、民主失落、限制人民、少数专制、权力腐败、资本支配负责。(2)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认为借自由竞争的名义而追求少数垄断资本的利益是中国改革面临的主要危险,把追求公平和公正当做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3)认为经济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扩张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无条件地融入全球化过程必然会损害民族国家的利益,导致对资本主义中心国的全面依附。因此,需要揭示“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不平等关系,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维护民族的权力和利益。(4)认为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关键是要实行直接的经济民主,在宏观上把人民主权的原则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

---

<sup>①</sup> 第五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默 (John E. Romer)、巴德汉 (Pranab K. Bardhan)、弗勒伯伊 (Marc Fleurbaey)、威斯考普弗 (Thomas E. Weisskopf)。

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sup>①</sup>

新左派的观点对于市场导向的改革从总体上说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而这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根本对立的。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新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比利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曾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强权和不公正,没有任何一个人类集团明显受歧视的社会。这是一个不以竞争、人皆为敌和个人发财致富的渴望,而是以合作和团结作为社会行为的主要动因的社会。废除主要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私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尽管尚不充分、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在他看来,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既不能克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弊病,也不能解决自由社会主义的弊端,这种理论所主张的混合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混合的神话(曼德尔,1992,1994)。《每月评论》2004 年 7/8 月号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的论文再一次充分地表达新左派的这一观点。论文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已经使由外资主宰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它不仅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也使大部分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停滞,大众的消费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经济的扩张日益依赖外国投资与出口,资源与环境的危机日益加剧,社会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最脆弱和不稳定的一环(Martin Hart-Landsberg, Burkett, 2004)。

新左派理论对市场经济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断地提醒和唤起着人们对社会公平、经济民主、国家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对于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公正,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关注往往是以牺牲生产力首要性为代价的,并转变成了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全面抗拒,这样就难免会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之中。

#### (四) 对中国经验的解释

1978 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已有的改革试验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改革的经验,如何说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趋势,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却众说纷纭,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成为过渡经济学中的焦点问题。

以萨克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如半工业化的经济结构、传统体制的松散性等,与改革的政策和改革的道路无关;另

---

<sup>①</sup> 新左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在本文中,新左派指的是那种既反对集中计划经济,又反对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主张用经济民主代替政府与市场的理论观点。在国外,新左派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出现了,并且经过了若干代的发展。中国新左派则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有的学者对当前中国的新左派作了如下的定义: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萧功秦,2002)。一般认为,中国当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有汪晖、甘阳、崔之元、韩毓海、王绍光和王小东等。他们的文章和观点主要发表在《天涯》、《读书》、《二十一世纪》等书报杂志上。新左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相近之处,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些新左派学者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许多新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持批评态度,他们的理论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一方面他们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十分有限的，中国的改革面临着许多困境，而这种困境正是由于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所导致的（Jeffre Sachs，Wing Thye Woo，1994）。由此形成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中国经验的典型论调：

“所谓‘中国奇迹’的提法，由于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经济信条的质疑，在主流系统中也就往往被否定。一种每隔一段期间就会冒现的论调是：只要耐心等待，早晚还是可以见到经济灾难降临中国，作为对它偏离世界主流规范的惩罚。这种论调的学术化版本，认为改革以来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同时包含着符合市场规范和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而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符合市场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应该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从而，当中国的经济‘转轨’从所谓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的经济前景即使乐观地看也很不明朗，更有可能的是将出现危机”（卢荻，2001）。

但是，多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经济转型的不同绩效与改革的道路和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试图揭示中国改革道路的内在逻辑。

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形式，因此，对双轨制的分析就成了揭示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的基本环节。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界对于双轨制的分析集中在价格双轨制上，90年代以后，对于价格双轨制的理论说明更加精细和专业化。例如，罗兰德等人运用微观经济学均衡模型证明：价格的完全自由化必然导致经济产出的下降，而中国价格双轨制则可以避免这种结果（Geard Roland and Thierry Verdier，1999）。在《“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一书中，张军对于价格双轨制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他的结论是，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作出的反应更迅速（张军，1997）。但是，与此同时，所有制双轨制逐步代替了价格双轨制成为了理论分析的重点。在1992年发表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战略的经验”一文中，Mark Knell 和 Wenyan Yang 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特点不是一步放开价格和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是逐步放开价格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非国有经济，从而在经济生活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产生了硬性预算约束和足够的供给反应，导致了短缺的逐步消失，并迫使国有企业改变其行为方式，推动了经济增长（Mark Knell and Wenyan Yang，1992）。樊纲明确地把渐进式改革概括为增量改革。他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在旧体制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并随着新体制的逐步壮大逐步改革旧的体制；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则在于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并以此来为新体制的成长铺平道路（樊纲，1993）。布兰查德提出了一个将双轨制一般化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要素是私有企业的成长、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私有经济的增长减少失业，国有企业的改造导致失业，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高失业阻止国有企业改造；第二阶段，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私有企业吸收国有企业调整中释放的失业（Olivrer Blanchard，1997）。因此，先发展私有经济，然后再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科尔奈把所有制改革的战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有机发展战略（A 战略），一种是

加速私有化战略 (B 战略)。A 战略是希望, 通过新的私有经济的出现和私有经济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重的扩大, 同时通过出售和清理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B 战略的设想是, 通过转送的方法发展人民资本主义, 快速消灭国有制企业。他认为, 前一种战略是成功的, 而后一种战略则是不成功的 (Kornai, 2000)。

另外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说明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和经验。美国的左派学者大卫·科茨把中国的改革战略称作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反的国家指导下的转型战略, 它包括了如下要素: (1) 价格控制的逐步放开; (2) 长期推迟国有企业私有化; (3) 在一段时间内, 在大型国有企业决策中保留国家指令; (4) 政府开支的增长, 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的国家投资方面; (5) 一般情况下的扩张货币政策; (6) 国家银行系统持续控制; (7) 国家对跨国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控制 (大卫·科茨, 2005)。诺顿认为, 中国改革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1) 在保留旧的行政体制的条件下开始进行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工业结构的调整。(2) 农村改革很快获得成功。(3) 在政府垄断的部门逐步放松进入控制。(4) 建立了价格双轨制。(5) 在计划的规模绝对不变的同时, 允许经济在计划外增长 (Barry Naughton, 1994)。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 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 把中国改革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概括为五个重要特征, 即: 以农业改革为突破口; 强调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 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 重视发展出口以及进入世界市场; 国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

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和经验, 推动了人们对转型过程的认识。

## 二、经济转型及中国经验的主要问题及其理论解释

围绕经济转型所进行的种种理论和政策上的讨论和争论, 对于中国经验的种种不同解释, 可以归结为对若干基本问题的认识, 理解经济转型的过程和内在逻辑, 需要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和讨论。

### (一) 宪法制度与改革道路<sup>①</sup>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实际上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给定的制度框架内, 寻求实现基本制度的最优形式。这个意义上的改革只涉及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 而并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二是基本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这个意义上的改革则涉及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认识或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修正。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统一的。其中宪法制度的创新是制度变迁的核心。但是, 对于这个重要的事实, 最初的经济转型理论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改革初期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中国的改革是改体制而不是

<sup>①</sup> 本文所说的宪法制度是指社会的基本制度, 主要由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组成, 它与自由主义理论所说的宪政含义有所不同。自由主义理论所说的宪政, 特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其核心是限制国家权力, 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

改制度（实际上指基本制度或宪法制度）。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出现的各种过渡经济理论，又大都把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与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差别归结为市场化的方式方法问题。比如，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是整体推进还是分部推进，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是经济改革为主还是政治改革为主，是增量改革还是存量改革，是先立后破还是先破后立，是从农村开始还是从城市开始，等等。上述的观点一般只涉及制度安排问题，而没有涉及宪法制度问题，尤其没有考察宪法制度与改革路径的相互关系，但是，现实的改革过程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它既包括了宪法制度约束内的选择，也包括了对宪法制度的选择（詹姆斯·布坎南，1997）。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过程、约束（宪法制度的约束）内的选择和对约束的选择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正是制度变迁理论和过渡经济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从经济转型的现实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分野主要不是由于市场化的速度、方式和次序的不同造成的，而是对于宪法制度的不同选择造成的，宪法制度的差异对于改革路径的分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张宇，1997），这是因为：

1. **宪法制度的内容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内容。**宪法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制定规则的规则。迄今为止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改革中具体的制度安排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支配，体现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要求。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则对原有的宪法制度采取推倒重建的“革命”性态度。

2. **宪法制度变化的方式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式。**渐进与激进并不是就制度安排而言的，而是就宪法制度而言的。渐进式改革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采取了边际性调整的方式，从而使改革过程具有温和的、连续的和长期的特点。而激进式改革则由于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采取了推倒重建的态度，因而改革必然是全面的、非连续的和激烈的。

3. **宪法制度规定了集体选择的条件和基本规则，从而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制度创新的方式**（V. 奥斯特罗姆，1996）。或者说，宪法制度决定了制度博弈的结构或“改革的程序”（周振华，1999）。改革的程序不同，改革的方式、路径和结果也不同。

中国渐进式改革和苏东激进式改革的区别正如科尔奈所概括的那样，不在于转型的方式和速度，也不在于它们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而在于是改革还是“革命”（Kornai，1995）。或如萨克斯和杨小凯等人所说的，在于宪政的转轨。不过，虽然科尔奈等人看到了宪法制度的关键作用，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首先，他们把经济转型的实质和目标断然定义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他们所谓的宪政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宪法制度，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经验。其次，他们片面地强调宪政制度的意义，把宪政制度当做一种先验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并用宪政转轨的目标代替了市场化和资源配置合理化的目标，从而忽视了在制度安排和宪法制度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动态演进关系。

就中国的改革经验来说，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在于能否把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稳定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改革方式的种种特点也只有在宪法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才能准确加以说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是双轨制度问题。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典型形式,它的出现固然可以从微观效率的角度找到其合理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由宪法制度的性质决定的。激进式改革是在彻底否定传统宪法制度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构造新体制,新旧体制在这里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新与旧之间的转变过程越短越好,越快越好,基本上不存在稳定的明显的过渡阶段和过渡形式。而渐进式改革则是在原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引入新的市场体制,因而,在这里新旧体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兼容的;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旧的体制并不因为改革而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既有的利益结构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新的利益关系要通过边际性调整加以产生。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体制的转换显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旧体制长时期的并存、摩擦、融合和交替,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显著差异,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产物。

第二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国有企业大规模的私有化是激进式改革中的一项核心政策,这项政策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有的学者从方式方法的角度出发批评快速的私有化战略,他们不反对私有化的改革目标,但是认为受扭曲的工业结构、市场机制和制度条件的限制,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而会造成市场垄断,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因而主张实行渐进的私有化战略;还有的学者则对私有化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合理性本身提出质疑。但是,为什么大规模快速的私有化在引起深度持续的经济衰退时仍然可以大行其道?真正的答案或许是,快速的私有化对于激进式改革来说不仅是经济上的要求,更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有大规模的私有化,才能迅速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使所谓的“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事情。正如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智力方面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统治者的利益将首先得到满足,然后,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考虑其他的利益团体(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2000)。同样,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没有把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之所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宪法制度的约束无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宪法制度是经济制度的核心,宪法制度的创新是经济改革实质所在,能否通过对宪法制度不断进行的边际调整,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持续、动态的合理关系,避免在它们之间产生不可解决的严重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累积性矛盾,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否持续推进的基本条件。

## (二) 市场经济的含义与转型的性质

经济转型的路径与转型的目标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转型的目标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但是,理论和政策上的讨论和争论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被普遍认同而失去意义,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旗帜下可能包含着大相径庭的市场理念,实际上,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正是不同的改革理论和改革道路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市场和政府都会出



现失败，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后凯恩斯主义者以经济的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货币的内生性、成本加价等基本概念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市场理论。演进主义认为，市场不是资源配置的机构，而是知识和信息交流的机制，由于知识和信息是主观的，而且是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所掌握，因而，市场制度只能自发生长，不能人为构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以交易费用为基础，把市场化的核心归结为“产权的明晰化”，并把改革的过程理解为理性人通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而进行的制度博弈。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保护下协调个人的行动，因此，宪法和政治秩序的选择在逻辑上比关于市场相互作用过程的讨论更为重要。对于市场经济的不同认识表明，重要的不仅在于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还在于弄清这一目标的具体含义。

人们经常把建立市场经济形容为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这种类比其实并不恰当，有简单化的倾向。其实，建立市场经济不同于修路盖房子，必须事先有一个精确细致的施工图样；也不同于生产某种物质产品，必须遵循固定的工艺流程。作为改革目标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复杂的社会系统，认识这一复杂系统应当注意以下事实：

1. 整体性。从表面现象上看，市场机制是以价格为核心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但是，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价值又反映了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换关系，没有产权制度的改革，价格信号是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产权制度的根本改革又要求有完整的生产要素市场、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而所有这些因素归根到底又是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剩余的增加、社会需要的丰富、人的能力的提高、社会分工广泛、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推动着市场经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因此，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仅仅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而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

2. 历史性。市场经济并不是一种可以脱离开具体的社会结构而存在的物质设备或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下的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因此，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古典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现代的市场经济，英美模式不同于德日模式，东亚模式又有自己的特点。迄今为止的中国市场化的试验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宪法的约束下推进的，在今后的改革中还要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这些深刻的历史背景赋予了中国市场经济特殊的历史内涵。

3. 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因而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中国，把改革目标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了的，而是改革实践不断深入的结果。1979年以来，中国在改革目标的选择上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几个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被明确定义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使如此，这一目标也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和试验中才能逐步完善。

简而言之，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源配置方式的转

变问题,而是一个与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历史变迁相伴相随的,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创造与毁灭的社会转型过程,这一过程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张宇,1997),不可能通过“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一蹴而就。这就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根据。

### (三) 市场与政府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基本方向是由集中到分散、由集权到分权、由管制到自由的转化以及对自发秩序的合理性的肯定。中国 20 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行政垄断过强,政企不分严重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基本方面。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特别是在改革初期和中期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重体制,政府对经济生活直接和间接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非国有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比较有限。即使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确立之后,政府仍然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对于这一事实的意义,学者们的评价大相径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计划与市场结合的产物,是对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有力批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高鸿业,1996;伊藤诚,1996;胡鞍钢,王绍光,2000;大卫·科茨,2005)。而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些学者则从同一事实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政府调节持否定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市场部门取得的,庞大的国有经济和广泛的政府干预只是起了抑制经济活力、损害经济成长的消极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发挥了市场的作用,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是政府干预所致。按照这种观点,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以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看法虽然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是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实际上,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抑制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政府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政府的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于国家强盛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更是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能充分履行其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强政府,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弱政府和小政府。近 20 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也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健全的法律体系、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发展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发挥政府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以下一些特殊的理由：

1.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制的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非公有制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国家不仅要作为宏观经济的调节者，而且要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介入经济运行过程，发挥其作为所有者所承担的分享收益、战略决策、资产监督、管理人员的任命等重要的职能。国家的这种作用并不总是有效的，但却是必须和必然的。

2. 作为一个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将长期处在市场欠发达状态，市场发育的深度、广度和完善程度都受到了很大局限，市场失灵的范围和规模要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这不仅要求政府调节的广泛存在，而且给政府提出了培育市场、建设市场和组织市场的改革任务。同时，后发工业化国家所面临的赶超任务不可能仅仅以自发演进的方式来实现，它要求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加速国内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推动重点部门和重点企业的迅速扩张，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增强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3.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要经历一个新旧体制长期并存的双重体制阶段，在双重体制并存阶段，较多的行政干预虽然不符合目标状态的要求，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基础产业落后、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国际竞争激烈以及新旧观念冲突等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威胁，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保证国家独立、社会稳定、法制严明、经济繁荣的强有力政府，经济和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和无序状态，改革和发展会受到阻碍。

需要强调的是，强政府既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杠杆，同时也导致更大的政府失败，权钱交易、官僚主义、市场扭曲的广泛存在就是广泛存在的政府干预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因此，转换职能、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强化约束、反腐倡廉、积极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经济转型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 （四）市场化与民主化

宪法制度与市场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由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的主导作用，使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具有了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中，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是无可争议的两面旗帜，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二者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使经济转型的前景扑朔迷离。历史的经验表明，市场化与民主化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这主要的原因是：

——市场化打破了封建的等级制和人身依赖关系，奠定了独立政治人格的经济基础，造就了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

——市场化是以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因而,市场化的发展扩大了分权的范围,减少了集权和专制的可能性。

——市场化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这表现在政治体制上,要求权力的相互制衡。

——市场化改变了社会的价值标准,用货币本位代替了官本位,用货币拜物教代替了权力拜物教。

——市场化创造了竞争、开放和不断变化与创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封闭、保守和狭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瓦解。

虽然民主化与市场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们二者毕竟不能等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互对立的。市场化强调个人自由,民主化则强调社会的联合;市场化要求发挥个人的首创性,民主化要求发挥社会的协调作用;市场化以私人分散决策为基础,民主化则以公共决策为基础;市场化首先是要设法限制国家权力,民主化则是要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权力(萨托利,1993)。因此,不能用自由或市场代替民主,也不能把政治的民主当做市场经济必然的产物。

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问题,也是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围绕着这一问题,形成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自由主义的思路,即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由自由和民主或“对民众的保护”和“民众的权力”两部分构成,在这两个要素中,民众的保护是决定性要素,它的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民众权力则是第二位的要素。这种类型的民主与“直接的民主”、“参与的民主”、“纯粹的民主”等类型民主制度格格不入(萨托利,1999)。自由民主制是资本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自由民主制也在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它被自由主义者们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的真理”和经济转型的本质所在。

第二种思路是“新权威主义”的思路。新权威主义理论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非自治的个体一旦摆脱了对垂直隶属的权威组织结构的羁制,又不可能受到契约性人际关系的制衡,其结果,便会重新陷入类似历史上权威解体以后出现的“争则乱,乱则穷”的社会失衡状态。因此,在过渡时期必须借助于某些适应于受治者的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既有价值符号、信仰体系和某些约定俗成的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以及组织化的强制力量,作为自上而下整合社会秩序和维系人心的基本手段,借助于传统的政治手段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萧功秦,1989)。东亚经济转型的成功被看作是这种模式的典范。

与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相比,新权威主义似乎具有更多的现实感,但是,它对于自由民主制的批评是就过渡的方法而言的,并不否定其基本的价值观和制度框架,这样的批评难免会自相矛盾,如罗伯特·安格和崔之元所说:

“在东亚和其他地方盛行的政治权威主义是强化国家的捷径。然而这是一条危险的代价递增的捷径。它必然导致政治——官僚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共谋,使国家强度受到限制,使经济发展服从那些与精英们作交易的人们的利益。日益腐败的精英以其迷恋权力和试图把公共职位变成私人特权的行为表明,他们一般偏爱一些更具传统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表明贪婪的商人和政治暴君经常是一致的。急于建立私人钱柜的官员们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传统产权作掩饰”。“如果中国永远不接受深化民主道路，那么它必然要在精英主义的共谋的强硬国家形式和国家的弱化之间作出选择。国家弱化意味着精英利益和精英交易，以及公共职位向私人特权转化的普遍化——它伴随着政治权威主义的受遏制的撤退”（罗伯特·安格，崔之元，1994）。

因此，需要在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

这第三种思路就是“新左派”的思路。“新左派”既反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也反对自由市场经济，而主张在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崔之元，2003）。他们认为，集中的计划经济必然造成严重的官僚主义；自由的市场经济则既不能保证政治民主，又不能带来经济效率；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则由于强调了私人财产的优先地位和劳动者在经济上对资本的高度依赖而使民主成了空洞的诺言（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2003）。只有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结合，为人民主权这一概念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空洞的民主理念，实现自由和民主的统一。苏东剧变后，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等在内的不同流派的“左翼”学者吸取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都把追求更加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大大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sup>①</sup>，而直接的经济民主则被看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

“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批判发人深思，但其理论的可行性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在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之后，经济民主的实践尚未有成功的范例。

### （五）演进主义、构建主义与实践理性

改革的目标能不能设计？改革的过程能不能控制？对于这一问题历来存在着所谓演进主义和构建主义两种对立的看法。演进主义认为，制度变迁过程是不可知、不可控、不确定的，因而只能自发演进；建构主义则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是可知的、可控的、确定的，因而是可以人为建构的。这两种观点都具有其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某些片面性。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演进主义特点：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丰富多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有意识地允许、特许或默许局部的“犯规”或“越规”行为，并在实践证明是合理的情况下加以普遍推广；除了若干最一般的指导原则，中国的改革将许多问题都留给实践，具体的目标、步骤、办法等都是在不断对一系列难题作出选择而自然形成的。个人、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制度创新中发挥了空

<sup>①</sup> 林德布洛姆的观点可以为这一理论作证（尽管他并不能算是“新左派”）。林德布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的多头政治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特殊的形式是与特殊的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多头政治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产生于私有制，并为私有财产的自由交易提供制度保证。因此，多头政治之所以与市场制度相连，不是由于它是民主的，而是由于它是不民主的。也就是说，也许真正的民主不依赖市场制度。只有现有的多头政治——也仅仅因为它，虽然它是鼓吹自由的——是由实业界和财产关系用非民主的方式控制的（林德布洛姆，1993）。

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完美的设计、精确的计算和全面的规划,往往还没有形成就被实践抛到了后面。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却具有更高的指导意义(华生等,1989;郭树青,1990;王逸舟,1993)。

另一方面,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又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制度的构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改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改革目标的提出和调整、改革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宪法制度的修订、市场规则的建立、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等,无不是国家有意识构建的结果。特别是在改革的初期,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更是强烈地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从而使中国的改革方式同时具有了明显的政府主导型或供给主导型的特点(杨瑞龙,1996)。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剩下的问题不就是在确定的条件和目标下寻求最优的改革路径吗?不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改革的目标吗?既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为什么不采用整体推进,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战略呢?为什么还要走一步看一步,循序渐进呢?如果我们把认识的视角从市场化的方式方法和局部性的制度变迁转移到整体的社会结构和宪法制度的演进上,就可以发现,改革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不能被简单化为某种追求极大或极小的经济计算问题,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性的原则来设计和构建,这是因为:

1. 社会系统是一种复杂的有机系统,社会的进化过程是独特的、不可逆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和易变性(Ulrich Witt, 1993),因而,人们不可能对改革的目标作出准确无误的设计,并按照这种预定的设计加以实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

2. 改革的目标、路径和宪法制度的演进并不完全是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一定条件下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博弈的结果,它取决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不同个人与不同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合力。

3. 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过程是分不开的,没有过程也就没有目标。作为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脱离开改革的过程而先验存在的,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只能在改革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实践逐步形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4. 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是密切相联的,初始的社会结构和宪法制度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这种所谓的“路径依赖”现象,使自由选择这一概念在制度变迁中的意义大打折扣。

有的学者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忽视改革过程和利益关系的片面性,并把改革的核心问题理解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盛洪,1995)。还有的学者根据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得出了关于改革路径的一般规律,即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激进度”的增函数(樊纲,1993)。但是,这种理解实际上正是反映了新古典的思想方法,使用这样的范式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激进式改革的思维逻辑。制度变迁过程所具有的演进主义特征,使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智力游

戏。由于改革的起点、目标、约束条件不同，由于改革过程和改革的未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社会成本很难直接比较。即使我们承认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的区分，并假定两种成本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我们也得不出上述的结论。从演进主义的观点看，渐进式改革同样可以降低所谓的实施成本，这是因为：

1. 人的理性和知识是有局限的，而社会秩序是复杂的，因而，人们只能从错误中学习，一步一步地走，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准确的信息和知识，防止改革出现大的失误。相反，变革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未意料到和极不希望出现的反响也越多，并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的历史灾难（卡尔·波普，1987）。

2. 一个社会的知识和信息的储备是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获得的，渐进式改革承认现存组织在长期运作中所掌握的信息的价值，因而避免了信息和组织资源不必要的破坏的浪费。而激进式改革则破坏了现存的组织结构和信息贮存，使人们的行为失去了稳定的预期，从而增大了改革的组织成本和信息成本（彼得·蒙勒，1994）。

3. 由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信息从来不是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的，而只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能降低信息成本，有效利用信息资源。而大规模的以理性设计为基础的激进式变革却可能由于信息不足和风险过大而陷入困境（哈耶克，1989）。

实际上，指导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思想既不是演进理性也不是建构理性，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实践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理性。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推动的，执政党对于改革的看法，即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矛盾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困扰着社会主义者们，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由这一矛盾引起的。教条主义把理论视为神圣不变的教义，认为理想就是一切，手段微不足道；机会主义把经验视为真理的源泉，认为目标微不足道，运动才是一切，这两种片面性都是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造成的。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造成了经济社会的日益停滞，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决定渐进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只能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成了推动改革的第一面旗帜，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的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鲜明地反映了唯物史观的实践品格。由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成功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自发性与自觉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创造出了有效的实现形式。

### (六) 整体、局部与改革次序

改革的次序问题也是过渡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经济改革应当“边走边看进行单项突进式改革,还是进行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同步配套的改革”。在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中国的改革应当是整体的,一揽子的(吴敬琏,周小川等,1988);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整体设计的一揽子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渐进转轨方式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道路(华生等,1988)。<sup>①</sup>二是什么是经济改革中的中心环节,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应当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配套改革;有的学者主张以企业所有制改革为中心进行配套改革,还有的学者则主张把宏观体制的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

90 年代以后,整体性的一揽子改革成为激进式改革的典型形式。对于整体改革的必要性利普顿和萨克斯作了这样的证明:

“转型过程是一个无缝之网。没有价格制度的作用,结构改革就不可能成功;而没有过剩需求的消除和可兑换货币,价格制度就不可能发挥作用;除非价格是真实的,从而企业的关闭具有理性基础,否则信贷和宏观的紧缩政策就不可能持久。与此同时,由于结构调整是在需求紧缩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宏观经济的稳定一定会伴随着其他的措施,包括出售国有资产,放开私有经济,建立企业破产程序,着手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的改革,显然,改革必然是全面的。”(David Lipton, Jeffrey Sachs, 1990)

与激进式改革相比,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称作局部或分部改革,它是从一个个局部性的变化入手来改革旧体制的,最终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部分改革有两种表现形式:

1. 新旧体制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在渐进式改革中,新旧体制之间不是断裂的,截然对立的,而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它们之间的转换要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经过许多中间环节,采取许多中间形式。例如,经济改革的目标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演变过程;价格改革经历了改革初期的国家调价、1984 年以后的调放结合和 1992 年以后的以放为主等主要的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也经历了扩权让利、承包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等重要阶段。

2. 新旧体制在空间上的并存性。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部分之间,存在着改革次序和改革程度上的明显差异。例如:80 年代初在城市经济还处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的农村改革率先获得成功,取得巨大进展;在生产要素市场还处于计划管制的条件下,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商品市场率先实现了市场化,绝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分配和价格的形成纳入了市场调节的轨道;此外,价格、财税、金融、外贸、社会保障和企业等各方面的改革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不同步的。

经济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次序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要意志,而是由改革的性质和内在逻辑决定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采取分部推进的改革方式,激进式改革之所以选择整体配套

<sup>①</sup> 前一种观点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后一种观点参见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理论组的《论中国经济改革的任务与道路》[《中国:发展与改革》,1987(9)]以及华生等的《中国十年改革的回顾、反思与前景》[《经济研究》,1988(9)]。



的改革战略有其必然性。

1. 中国的改革是在宪法制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旧体制在整体上并没有完全丧失其现实的合理性，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逐步生成的。激进式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彻底否定，传统体制在这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新体制是在旧体制的废墟上兴起的。

2. 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的传统体制内部的结构比较松散，独立性和差异性比较明显。而苏联的传统体制则比较严密，比较僵化，长期累积的矛盾全面激化，从而使传统体制失去了进行自我更新和不断进行边际调整的能力。

3.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缺乏必要的理论，更缺乏足够的经验，使得改革只能从实际出发，走一步看一步，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推进。而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理论和实践上相对都比较成熟，采取整体改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问题在于，既然经济体制中的各个要素或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怎么可能分步独立地加以推进呢？其实，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并不否定它们的相对独立性。例如，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价格对于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只有在硬性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放开价格应当与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同步进行，但是，现实的企业是由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功能的许多具体企业组成的，现实的市场也是由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等不同类型的市场组成的，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完全一样的。农产品市场的放开与农户和消费者的行为密切相关，但与国有钢厂是否自负盈亏并无直接关系；农户的自负盈亏与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密切相关，但与钢铁的价格是否放开也无直接的关系。因此，整体改革并不意味着各项改革措施要同时展开，相反如果从局部改革入手却能绕开改革的难点，降低改革成本。

1. 先从那些改革成本较低，收益较高的部门开始改革，阻力少而收益大，容易取得实际效果。例如，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承包制改革入手，绕开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部门，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农业产值，获得了巨大成功。企业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入手，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引入了市场关系，解决了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使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2. 一些部门率先改革并首先获得成功可以产生连锁效应，推动其他部门改革。例如，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农产品，从而推动着城市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推动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沿海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先行一步带动了内地的改革与发展。

3. 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安排改革次序，可以逐步分解改革难题，降低改革的风险。由于新制度的各个部分在发育中所需要的条件和时间是不一样的，因而，改革有难易之分。这些难易不同的改革如果同时展开，缺乏条件的部分必然产生混乱，成为整个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障碍。相反，如果系统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改革的内容和次序是相对独立

的, 经济体制的不同部分就可以适应各自的环境作出相应的变化, 形成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当然, 部分改革与整体改革的区分是相对的, 激进式改革内部各部分并不是不存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 渐进式改革也不只是孤立的个体之间的简单合成。局部和整体永远是有差别的统一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 整体协调与分部推进的结合具有一般和普遍的意义。

### (七)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 是市场化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般来说, 市场机制是与分散决策联系在一起的, 而计划调节则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集中决策。因此,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 自由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地方分权, 认为地方分权有利于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 而国家主义者大多赞成中央集权, 认为中央集权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统一市场。更多的人则认为, 应当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不同观点, 在过渡经济学领域中都有所体现。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 地方政府扮演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戴慕珍把财政包干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行为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化合作主义, 这种模式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 保留了政府强有力的领导, 避免经受苏联东欧私有化和经济崩溃之苦。钱颖一等人认为, 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传统体制的 M 型结构, 即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 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在 M 型组织中, 基层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而且地区之间的联系是市场取向的, 这种结构削弱了行政控制, 强化了市场活动, 刺激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他们还把这种改革模式称为“从中国式的联邦主义到中国式的私有化的改革模式”(钱颖一等, 1993, 1999)。杨瑞龙认为, 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 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要主导型三个阶段, 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过程中, 地方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杨瑞龙, 2001)。

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强调了地方分权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就有了对“诸侯经济”、“行政性分权”的批评, 认为行政性分权一方面具有深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 在许多方面继续甚至强化了对企业和市场的行政管制, 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成为追求收益的最大化的市场化主体, 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投资膨胀、地区封锁等弊端的罪魁祸首, 结果既影响宏观调控, 又妨碍统一市场的形成, 同时还会导致更大的腐败(戴圆晨, 1988)。90 年代初特别是实行分税制改革前后, 对“诸侯经济”批评达到了高潮, 并形成这样一种有影响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 当前中央政府财力已经下降到了最低点, “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已经形成, 国家的统一面临着严重危险, 因此, 必须提高中央政府的能力, 抑制地方实力的扩张。这种观点还认为,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 必须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 其主要原因在于: 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一个制度真空中发生; 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冒出来; 市场转轨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 这就证明了波拉尼的这样一个观点, 即: 正是在中央集权式的干涉主义不断膨胀的前提下, 自由市场的道路才得以开拓并未曾再关闭(王绍光, 胡鞍钢, 1996, 2000)。布兰查德认为, 在中国, 地方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而在俄罗斯, 地方政府的

作用则是消极的，出现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集中度的不同。在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非常有限，因而对于地方政府通过的征税、寻租和管制来获取利益的做法无能为力。而在中国，集中化的政治结构使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奖惩手段，从而可以对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约束（Olivrer Blanchard, 2000）。

上述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实际上，地方分权既可能成为市场化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市场化的障碍；中央集权同样也是把双刃剑，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要承认，无论中央集权制有多少优点，但是它缺少自由与创造，无法适应市场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和政治权力从集中到分散，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变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地方分权、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尽快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适度集权的必要性而照搬所谓美国式联邦制度。抛开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要求不谈，单单注意到以下事实就可以理解中央集权的意义，这一事实就是：中央政府高度的组织动员能力、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和以强调团体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现代化获得成功的一个公认的重要因素，是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遗留给我们宝贵的制度资源，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也是东亚模式长于西亚、南亚、拉美乃至东欧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至也不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单纯权利的分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全局性和历史性的，即在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历史背景下，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的任务。

#### （八）改革与开放

改革与开放的相互促进，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基本特点，改革与开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因为，首先，市场经济最初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因此，对外开放尤其是向西方世界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开放，遵循所谓“国际惯例”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按照发达市场经济的规则改造国内的经济体制。其次，现代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国际化的，以追求价值和货币为目标的市场经济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它伴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使各国家、各民族日益联系在一起，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国各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现代世界体系”。改革与开放的这种一致性，使对外开放成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外开放的程度有多高，对内改革的程度就有多深。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改革经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国经济从最早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沿边开放、沿江沿路开放到内陆开放的开放次序，与中国经济内部不同区域市场化的发展次序大体是相同的；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发育次序，与从商品市场的开放到资本市场的开放次序也是大体相同的。上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伴随着信息化的滚滚浪潮，经济的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新阶段。随着中国正式加入 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个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新阶段,改革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改革与开放并不总是一致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首先,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机遇,更是挑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它们更多地获得资金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它们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有利于它们更快地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等等。另一方面,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权力集中在几乎不受任何监督控制的少数经济单位手中;全球性的经济混乱、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等等。全球化的二重性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应当是有选择有控制的,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其次,从总体上看,现代的世界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它们垄断着资金、技术、生产力、军事、政治等资源,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以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意味着,至少从世界范围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中性的。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保持相对独立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就必须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保持国家政策和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是渐进的,有条件的。

再次,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张宇,2004)。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发达国家只是一味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换言之,目前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对称全球化:货物和资本市场倾向于被全球化,而劳动力市场却被分割成许多板块;一方面是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另一方面是不同主权国家和政治社会的继续存在(萨米尔·阿明,2001)。全球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民族国家在可见的将来不仅不可能消失,而且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国家的作用甚至有所加强。特别是个别发达国家,正是凭借其强大的国家,才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其新帝国主义战略(俞可平等,2004)。而落后的国家要想实行赶超式的发展战略,获得后发性优势,同样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这同时也意味着,保持经济开放与经济自主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追求国家的自主性发展仍然应当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 (九) 初始条件的作用

在比较中国和苏联东欧改革的不同道路和不同绩效时,有许多学者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对初始条件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估价,他们把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不同绩效主要归结为初始条件的不同。比如萨克斯等人把中国渐进式这种有利的初始条件主要归结为落后的半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流动。Martin Raiser 把决定中国经济获得成功的有利的内部条件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即:中国是在非常稳定的形势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储蓄



支持；虽然中国的投资很少依赖外资，但它在利用西方市场和技术方面远远强于东欧；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内非常稳定；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结构更接近亚洲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高度工业化的东欧；中国的工业结构不同于以重工业为主的东欧；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不同于东欧，中小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占很大比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危机后，中国政府的政治威信并没有被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Martin Raiser, 1996）。世界银行在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一书中，则对中国改革获得成功的初始条件做了耐人寻味的解释。报告把中国改革所具有的有利的初始条件，归结为改革前物质投资的滞后收益，并列举了几个重要领域的初始条件，比如：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已具备了适当的物质、销售和人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但它缺乏激励因素，因而一旦个人激励措施得以引入，国家的作用得以改革，产出的迅速提高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在工业领域，1949年以后工业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重工业和大中型国有企业得到了很大扩展，这样，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已有一个进行建设的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意味着一旦投资政策下放后就会有許多轻工业投资机会。同时，当放松对小公司控制后，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很容易取得优势，等等。

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初始条件的上述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仔细看来其理论逻辑却相当混乱。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定，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是同样的，都是理性人，因而，资源配置问题被看作是一种与社会制度和历史环境无关的具有普适性的自然现象，认为市场机制总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在评价中国的改革经验时，他们又把改革的成就完全归结为初始条件的影响，认为不同国家的改革绩效与制度和政策无关，从而否定了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普遍意义。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难免使人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产生怀疑。近年来开始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均衡概念时，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所谓的“路径依赖”和“蝴蝶效应”的理论中，初始条件被当做决定制度演化方向的根本力量，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即所谓的非正式制度则又被看作是决定初始条件的主要因素（诺斯，1994）。为了避免这种理论上的片面性，需要把对初始条件的分析纳入到对制度演进的整体结构和一般规律的考察之中，也就是说，必须在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具体考察初始条件与技术、制度、人的行为和经济增长效率等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我们所能肯定的是，首先，初始条件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它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行动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效果的。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初始条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产生的，“文化大革命”使传统体制的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改革首先是为了解决这些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而发动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之间没有形成不可解决的累积性矛盾，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得以成功的制度基础。

2.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是一种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二元结构的存在为中国的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使改革在付出的成本投入比较

小、改革时间比较短的条件下获得较大收益,这是渐进式改革得以成功的物质前提。

3. 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政府的威信和领导能力没有受到根本的破坏,政府的主导作用得到了维护,政治结构相对稳定,渐进式改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改革能够在宪法制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推进,这是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组织前提。

不过,对于初始条件的作用不可低估,也不能夸大。首先,制度是人们创造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选择和社会实践,初始条件只为改革提供了初始环境,而不能成为决定改革成败的长期因素。有利的初始条件并不必然导致改革的成功,不利的初始条件也不必然导致改革的失败,只有把初始条件与制度、政策和人的行为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把握经济转型的过程。其次,初始条件的利弊是相对的。例如,俄罗斯工业化水平高,在短期内可能成为体制和结构转换的制约因素,但从长期看却意味着国民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反过来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低,从一方面看,可能有利于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从另一方面看,却使中国改革面临着巨大的过剩劳动力的压力以及形成现代市场经济。再次,初始条件是可变的。改革开始时存在的既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随着改革的推进在不断发展变化,例如,随着经济转型进入实质性阶段,各种社会冲突有可能加剧,改革初期存在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可能被破坏。进化不是命运,而是机遇,在同样初始条件下,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事件序列,进化的结果有赖于参加者的素质和技巧(拉兹洛,1988)。

总之,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初始条件对于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因为既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构成了人们从事社会活动和制度选择的客观前提和约束;另一方面,制度是人创造的,初始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正是由于制度变迁中存在着的选择性、能动性、变异性和不确定性,才使得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后发优势成为可能。实际上,是初始条件与政策因素共同决定了经济转型的效果。因此,对于初始条件的考察只有与制度变迁的整体动态的过程结合起来才有现实意义。

#### (十) 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文化的意义

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由人来推动的,是人创造了制度,因而,离开人,制度的变迁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行动是有目的、有意识并受感情、意志和理性支配的,是文化的产物,通过塑造人的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模式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在新制度理论中,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即非正规制度。同样的正规制度和宪法强加在不同社会时,由于非正规制度的不同会产生显著的差异,当正规的宪法制度发生变动后,非正规制度并不会立即对正规规则的变迁作出迅速反应,非正规制度的存在是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和路径依赖的主要根源。新制度经济学的上述理论成为了一些学者解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与苏东激进式改革路径差异的重要根据(诺斯,2000)。

如何把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中同样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文化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却是我们所不可否认的,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东亚模式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台湾、南韩、新加坡和香

港等地分别取得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获得了所谓“东亚奇迹”的赞誉，东亚模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虽然对于东亚模式解释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派、国家中心论、儒家文化论以及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不同的观点，但是，东亚经济的良好表现和特殊模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东亚模式的特征被概括为：经济优先主义、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外向型发展战略和相对均等的收入分配；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专家治国和渐进的民主化进程；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的结合。东亚模式的这些特征与它们所共有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一点，使它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同于拉美、东欧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现代化模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与东亚的发展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形成与自己特殊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从消极的方面看，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核心、自然经济为基础、团体价值为导向的。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和契约观念格格不入，市场经济的成长缺乏西方社会所具备的那种深厚的文化氛围，现代化与市场化也只能是长期的渐进的。从积极的方面看，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如家族观念、权威观念、秩序观念、教育观念等，经过改造和发展可以转化为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积极因素。

比如，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大包干”制度，实际上就是对家族主义这一历史遗产的继承。诺斯就曾注意到，当中国放弃“人民公社”，中国人可以立即退回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结构中去，而俄国放弃集体农庄时，他们却面对一大群失业工人无法安置。<sup>①</sup>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在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保障费用占国民收入的很大比例，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成为转型过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国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以传统的大家庭为基础的，传统的家庭制度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社会保障的代价（Laslo Csab, 1996）。

又如，自秦汉以后中国就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官僚政治和大一统帝国，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对于这一传统的意义，同样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布热津斯基在 1989 年出版的《大失败》一书中给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曾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指出，“一个放权中国还是中国，而一个放权的苏联则是解体的苏联”（布热津斯基，198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中国在现今世界中所显示出的不同的社会模式也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在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但其社会组织的严密程度令其他国家难以与之匹敌。工业化国家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常被转化为加强其自身的一种特殊力量。中国社会组织模式的急剧转变已经举世瞩目。”（费正清，1990，p. 24）

中国改革道路具有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主义精神，而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的产生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有的学者曾把这种特征称之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即它不在理论上去探求讨论，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并认为不必要去进行这种纯思辩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现实中如何妥善地处理它”（李泽厚，1987，p. 30）。这种精神渗

<sup>①</sup> 参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

透在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改革的思想路线之中。幸而有了这种精神,中国的改革才没有被无谓的理论争论、僵化的理论教条所耽误,但却在解决吃饭、穿衣即解决生存问题的驱动下,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向前推进。

当然,文化的作用不是孤立,更不是惟一的。相似的文化传统把中国改革道路与东亚的发展模式连接起来,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使中国的改革道路与东亚模式产生了众多差别,如:东亚模式的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而中国的经济主体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东亚模式的经济是外向型的,而中国的经济是内向型为主的;相对来说,东亚模式中的国家是小国和地区,而中国则是一个大国;东亚模式的成功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而这种条件目前已不存在;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也与东亚各国存在着根本差别,等等。中国的改革道路既在东亚模式之内,又在东亚模式之外。它分享了东亚模式共同的遗产,拥有和东亚模式一样骄人的成就,但是,它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又远远超出了东亚模式。

#### (十一) 中国经验的实质和意义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

1. 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导向的指导思想。
2.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和国有经济主导性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国有制经济。
3. 广泛实行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并把双轨制度作为经济转型的中介形式。
4. 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基层单位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
5. 地方政府在改革与发展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6. 整体协调、重点突破,从分部推进到整体转换。
7. 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性互动。
8.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保持政治体制的相对集中,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9. 实行自主的有控制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10. 实践理性,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目标。<sup>①</sup>

归根到底,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市场化的方式方法的不同,而是改革的性质、目标和历史环境的差异;苏联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是在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则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将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三重重大转型融为一体的转型过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整体性的过程,具有很大的新奇性、独特性和不确定性;特殊的改革目标、特殊的初始条件、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特殊的路线方针与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了从计划

<sup>①</sup> 参见张宇:《渐进之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避免了激进式改革中由于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所造成的秩序混乱和体制的中断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持续衰退，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经济的赞誉近年来也是不绝于耳，但是，在如何估价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批评的意见也不少见，主要有以下方面：

1. 认为存在着统计数据上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成就可能被高估了，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衰退则可能被夸大了。

2. 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

3.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外来投资和外来技术取得的，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增长的潜力有限。

4. 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巨大的失业压力、脆弱的金融体系、严重的收入不公和腐败。

5. 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代价巨大，造成了空前的生态和环境灾难，同时面临着日益强烈的资源特别是能源供给的危机。

6. 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政治制度的自由化或宪政制度的转轨等。

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的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既然改革中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弊端都是相同的，改革的道路也应该是相通的。所以，中国改革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林毅夫等，1994）。对中国经验的这种肯定观点近来则进一步被发展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北京共识”。

应当看到，不同制度和不同改革路径的比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改革的绩效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明显优于与原苏东各国的激进式改革。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更具有普遍意义，更符合一般的规律。这是因为，第一，不论渐进式改革还是激进式改革，目前都还在进行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第二，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在有些国家有效的做法，在另外一些国家就不一定可行。第三，改革的效果不仅与改革路径有关，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初始条件和“公共选择”的效率。最后，由于两种改革的性质、目标、初始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因而，它们之间的优劣和成本的大小很难直接比较。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说明哪种改革道路更为合理，更具有一般意义，而在于解释不同改革道路的演进过程，发现其客观内在的逻辑，在于说明：大体相同的改革起点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改革道路？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到底有什么根本的差异？为什么渐进式改革在中国获得了成功，而在苏东各国却失败了？为什么渐进式改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激进式改革却导致了经济的严重衰退？两种改革方式各自的前景如何？面临着什么样矛盾和问题？等等。

### 三、经济转型后期中国的改革模式

经过十多年的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市场经济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前苏联东欧各国,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可以定义为后转型时期,它的主要特点是:传统的计划经济被彻底打破,政府的作用大大削弱,经济体制呈现出了过度自由化的倾向,由此导致了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和经济增长的迟缓。进一步改革的任务是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转型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到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期或初级阶段。这一时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打破,市场调节的作用逐步增大,但是,市场经济还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在新旧体制并存的双重体制中,传统体制的因素还处于主导地位。(2)从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到中国加入 WTO 中国经济转型的中期。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得到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为目标的企业、财税、金融、外汇、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逐步确立。但是,新旧体制并存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国有经济改革的任务仍然比较繁重,双重体制的摩擦更加严重。(3)以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的经济转型开始从中期进入后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的形势、任务、矛盾和路径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 新的改革形势。经过 20 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2003 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达到了近 74%,非国有经济对 GDP 的贡献已经达到了 69%,90%以上的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来确定,关税税率已经降到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sup>①</sup>,因此,经济改革的任务已经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改革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国有企业改革任务繁重、生产要素市场化相对滞后、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说是初级的市场经济。

2. 新的发展阶段。2004 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 13.65 亿人民币,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 1 000 美元,实现温饱和小康的任务初步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78—2002 年,农业在 GDP 中的比重由 28.1%降到 15.4%,农业劳动力在就业中的比重由 70%下降到 50%左右,城市化的水平从 18%上升到 39.1%,工业化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并与信息化相结合构成

<sup>①</sup>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4 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153 页,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

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特别是随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阶段。

3. 新的国际环境。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经济的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急剧扩张的新阶段。随着中国正式加入 WTO，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日益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也进入了一个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的新阶段。2004 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到 11 547.4 亿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 606 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超过了 70%。<sup>①</sup>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强，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的全球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是经济转型后期改革和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4. 新的矛盾与风险。主要有：（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区域和不同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开始凸现，社会中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问题引人关注。（2）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短缺和紧张问题日趋严重，需求不足与资源短缺的并存可能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态。（3）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日益发展，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和对要素价格的控制依然广泛存在，这导致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广泛蔓延。（4）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和与此相伴生的经济波动、失业、两极分化等问题逐步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5）随着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对于全球生态系统的过度开发与破坏、全球性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依附的加深以及国际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累积起来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有利于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结构和效率、计划与市场的平衡，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和摩擦，带来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国有企业既依赖市场又依赖政府，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比较突出；政府的行政干预普遍存在，行政规则与市场规则相互干扰；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双轨制，造成了要素价格的扭曲和价格信号的失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行政权力大量转化为市场权

<sup>①</sup> 从表面数字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20% 左右的水平。针对这种情况，有的人士开始担心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利用外资额过度的问题。但是，一些专家认为，不能简单从“进出口总额/GDP”公式出发判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实际上，用世界银行通用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商品 GDP”公式，再以购买力平价加以修正，修正后的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实际上只有 20% 左右，远远低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如果考虑到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 50% 以上，简单计算的外贸依存度显然过高估计了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2002 年为 10%，低于 12.2% 的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 10.3% 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参见王梦奎：“我国不存在外贸依存度过高问题”，人民网，2005-01-21）。

力, 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广泛蔓延, 等等。在经济转型后期, 上述矛盾和冲突似乎也有加剧的趋势, 以至于有不少人担忧中国会不会掉进经济停滞、失业严重、腐败盛行、贫富分化和动荡等问题并发的“拉美化陷阱”, 会不会出现权力与资本相互渗透、转化、控制和结合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那么, 应当如何看待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呢? 这里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 既然腐败和两极分化来源于市场化, 因此应当停止和放慢市场化进程, 强化政府管制; 另一种观点则相反, 认为腐败和两极分化是政府管理和双重体制的产物, 因此应当实行激进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路线, 尽快减少和取消政府调节。前者取消了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必要性; 后者则取消了社会主义和国家主导的作用。这两种思路都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 然而, 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因此, 问题的关键仍然是: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如何判断改革的成败得失, 以及由此决定的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

应当认识到, 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约束, 而宪法制度的形成和演进则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长期作用和累积的产物, 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自由选择, 不是随意可以加以改变的。在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转型的后期, 渐进式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形式, 符合中国的国情, 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不过,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 在经济转型的后期的渐进式改革与以前相比必然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比如:

在改革初期,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 而在经济转型后期,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基本经济制度。

在经济改革的初期, 商品市场的发育是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而在经济转型后期, 资本市场、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规范成为市场化的关键。

在改革初期, 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了增量改革、双轨过渡的改革形式, 而在经济转型后期, 随着新体制的逐步确立, 存量改革成为改革的主要形式。

在改革的初期, 渐进式改革主要由行政指令加以推动, 而在经济转型后期, 经济改革的推进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在经济改革初期, 渐进式改革的动力以内源为主, 而在经济转型后期, 经济改革的议程强烈地受全球化和国际规则的影响, 等等。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 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相比, 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面临着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难点问题。中国渐进式改革能否获得最终成功的关键, 是要通过对宪法制度不断进行的边际调整, 使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持续、动态的合理关系, 避免在它们之间产生不可解决的严重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累积性矛盾。同时, 为了使渐进式改革能够持续推进下去直至最后的成功, 作为改革的领导者的党和政府需要具有应付持续变迁、整合转型冲突、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 从而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有效发挥主导作用, 在稳定与改革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目标。



## 四、总结：过渡经济学的意义与前景

### （一）转型与经济学的发展

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的认识，并使经济学中的一些假设和命题受到了新的检验，主题、视角发生了新的转变，一些基本理论被重新检讨和反思，推动着一次新的理论综合。

1. 经济制度的作用和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2. 对宪法制度、利益集团和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研究得到了加强。
3. 对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自发性和不确定性的理解有了很大提高。
4. 对经济转型和市场演化过程的整体性（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认识日益深刻。
5. 在主流经济学与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新政治经济学之间出现了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

这种理论上的综合不仅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 and 选择，同时还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正如新的综合发展观认为的那样，促进发展需要更广的目标和更多的手段，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目标和手段都过于狭窄；人们的目光不能只盯住 GDP 数值，而应当追求民主、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市场的有效运转不仅需要自由化、稳定化和减少政府干预，而且需要健全的金融规制、有效的竞争政策、促进技术的转化和鼓励透明化；发展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着眼于这样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必须包括公共部门、社区、家庭和个人的发展问题；维护社会组织并提高社会资本，是发展变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成功的发展还需要思维的转变，与成功的发展相对应的进程，反映出的正是这些为全球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社会（Joseph E. Stiglitz, 1998）。

### （二）过渡经济学的局限

但是，转型经济学的上述各种理论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不足。

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想状态下市场机制的运作问题提供了一套看似精确的理论和工具，反映了成熟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这对于认识经济转型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运作的理论，而不是关于市场生成的理论，它舍弃了时间，抽象掉了制度，又忽视了政治、文化和传统的作用，从而把复杂的制度变迁问题简化成了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问题，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简化成了“管住货币，放开价格”。这种过分简化的经济思维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的动态过程。新古典理论把渐进式改革的经验仅仅归结为有利的内部条件，这样它就不可能对实践提出的挑战作出真正回答，比如，既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那么为什么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改革与发展能够持续推进？既然行政管制与市场制度是对立的，为什么双轨制能发挥积极作用？既然初始条件已经决定了改革的成败，制度的选择和人们的行动还有什么

意义?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想的市场王国中, 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 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 如经济的不确定性、时间的不可逆性、市场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货币供应的内生性等, 更符合转型经济的实际, 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很值得重视。但是, 从总体上看,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一个发展, 因而, 它不可能超越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局限性。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一样, 它是关于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学理论, 而不是关于市场机制生成的制度变迁理论; 它脱离开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具体的历史环境抽象地考察市场的运行, 而没有对转型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集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而, 也就不可能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完整的说明。

演进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社会进化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理性的局限性, 对于人们克服激进式改革的简单思维有积极意义。但是, 由于它否定了人类认识和控制社会的可能性, 否定了社会理性和集体行动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否定了社会变迁中存在着客观的内在规律, 从而把人类社会与自然进化完全等同起来了, 因而, 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 也无法为人们有效地制定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新制度经济学把理性人的范式套用于制度分析中, 把社会当做个人的简单加总, 无法解决个人与社会的整合问题; 把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归结为抽象的交易关系或契约关系, 把交易费用当做解释一切社会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 否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否认生产过程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 最后只能把社会制度的变迁仅仅变成个人心理的偏好或文化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 第一, 上述这些观点大都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缺点, 即都是在改革的目标相同而且确定的假定前提下, 围绕着改革方式的差别而展开讨论的, 而没有深入考察改革过程与改革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 改革方式的优与劣、改革政策的成功与失败、改革措施的成本与收益等问题, 都只有在确定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加以考察才有充分的意义。第二, 关于经济转型不同范式以及对中国经验的不同认识归根到底取决于理想社会目标状态的认识,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进经济学还是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都是以资本主义宪法制度为取向的, 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则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新左派理论则既反对资本主义, 也不认同市场社会主义。这些理论范式的科学价值最终只有通过不同制度的竞争的结果才能得以确认。第三, 不同的改革方式和道路并不完全是人们有意识选择出来的, 而是既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下不同的利益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而, 对于改革方式的认识不能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描述, 而需要在社会结构的整体过程中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的历史过程, 对于这样一个整体的历史的过程, 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基础的上述的经济学范式从总体上看不是分析问题的恰当的和科学的方法, 只有从整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出

发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来。

### (三) 整体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范式

在《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一书中,笔者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建立一个整体历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张宇,2001),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说明,这一理论框架的要点是:

1. 制度变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进行的制度博弈的结果,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制度的变迁归根结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制度选择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使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归根结底,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制度理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

2. 改革的目标与改革的过程、宪法制度内的选择和对宪法制度的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制度变迁理论和过渡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改革的方式和制度安排的不同,而是改革的目标和宪法制度的约束不同,能否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持续地推进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通过宪法制度的边际性调整,实现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决定中国渐进式改革成败的关键。

3. 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的、历史的和动态的现象,不存在抽象的固定的和脱离开特殊历史条件与制度环境而存在的市场经济。对于经济转型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且在于选择符合实际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且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对改革的目标进行逐步调整,从一个发展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4. 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重要也更加密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对经济制度改革来说是内生因素,经济转型的成败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且取决于政治和文化因素。只有从社会整体结构的演进和各个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对改革的实际进程和内在逻辑作出比较完整的说明。

5. 历史是连续的,人们不可能凭空创造历史,制度的变迁和选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或初始条件下进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个社会初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对于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人们在环境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环境随着实践而改变,制度的变迁充满了选择,初始的社会结构和现实的社会选择共同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

6. 社会制度的变迁是演进性与构造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因素,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把握和控制社会制度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人创造的,不存在离开人类的活动和意识而自然生成的制度,制度进化和发展既是演进的,又是构造的;既有不确定性,也有确定性;既是自发的,又是可控的。

#### (四) 转型经济学的意义和它的未来

转型经济学的出现不过是经济学悠久历史中短暂的一幕。经过十多年的经济转型,随着后转型时期或转型后期的到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转型经济学将逐步丧失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然而,转型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丧失,相反,却有着普遍和持久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制度演进过程的理解,也不仅是因为建立发达和完善的市场经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东欧各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重要的是因为,市场化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方式不断变革,社会关系持续变迁,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创造性的毁灭”永不停息,过渡与转型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而日益成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正常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深刻的变化之中,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全球化,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永不停息。因此,从这一点来看,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社会转型和过渡的科学,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恩格斯,1995, pp. 489-490)。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过渡经济学有着普遍和持久的历史意义,它将在人类社会不停顿的变化中得到发扬光大。

### 参考文献

- [1] 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 [2] 热若尔·罗兰. 转型与经济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3] 青木昌彦等. 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 [4] 樊纲. 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路径. 经济研究, 1993 (1)
- [5] 樊纲. 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 [6] 彼得·蒙勒. 论激进经济改革与渐进经济改革. 载李兴耕等编. 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 [7] 戴慕珍. 中国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制度基础. 载甘阳, 崔之元编. 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 [8] 华生等. 中国改革的十年: 回顾、反思与前景. 经济研究, 1988 (12)
- [9] 科瓦科斯. 改革经济学思路的演进与分类. 载周小川编译. 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0
- [10] 卢荻. 变革性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分析.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 [11] 王辉. 渐进革命.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 [12] 张军. “双轨制”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改革 (1978—1992).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13] 杨瑞龙. 中国制度变迁方式三个阶段论. 经济研究, 2001 (6)
- [14] 钱颖一, 许成钢. 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 1993 (10)
- [15] 郭树青. 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与经济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变. 经济研究, 1990 (10)
- [16] 王逸舟. 东欧方式、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 天津社会科学, 1993 (1)
- [17] 王绍光, 胡鞍钢. 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报告.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 [18] 王绍光, 胡鞍钢. 政府与市场.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0
- [19] 伊藤诚. 现代社会主义问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20] 林毅夫等.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21] 罗伯特·安格, 崔之元. 以俄国为镜看中国. 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 1994 (4)
- [22] 崔之元. 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的未来. 载曹天予编. 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3] 塞缪尔·鲍尔斯, 赫伯特·金蒂斯. 民主与资本主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4] 萧功秦. 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 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 2002-01-25
- [25] 萧功秦. 过渡权威论与中国的改革运动. 载李军等编. 新权威主义.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 [26] 埃内斯特·曼德尔. 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 载戈尔巴乔夫等著. 未来的社会主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 [27] 埃内斯特·曼德尔. 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 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28] 高鸿业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经济学研究.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 [29] 乔·萨托利. 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 载刘军宁编. 民主与民主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30] 乔·萨托利. 民主新论.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 [31] 杰弗里·萨克斯, 胡永泰, 杨小凯.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
- [32] 周振华. 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33] 詹姆斯·布坎南. 宪法经济学. 载市场秩序与公共秩序.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34]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35] 大卫·科茨. 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国外理论动态, 2005 (2)
- [36] 吴敬琏, 周小川等. 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8
- [37] 萨米尔·阿明.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 载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 批判的范式: 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38] 俞可平等.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39] 张宇. 过渡之路.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40] 张宇. 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 [41] 张宇.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 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 年第三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42] 费正清等. 东亚文明: 传统与变革.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 [43]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44]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学.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 [45] 盛洪主编. 中国的过渡经济学.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46]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研究丛书. 90 年代的改革和计划的作用.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3
-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版.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8] Allce H. Amsden, Jacek Kochanowicz, Lance Taylor. *The Market Meets It's Match*.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9] Barry Naughton, "What Distinctiv about China's Transition?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and Overall System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1994 (18)
- [50] Davad Lipton, Jeffrey Sachs,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0 (1)
- [51] Cao Yuan Zhang,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From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o Privatization, Chinese Styl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9 (7)
- [52] Fedrico Sturzenegger and Mqriano Tommasi edit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98
- [53] Gernot Grabber and David Stark, "Organising Diversity", in *Theorising Tan-si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edited by Adrian Smith and John Pickles. Routledge, 1998
- [54] Geard Roland and Thierry Verdier, "Transition and Output Fal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9 (7)
- [55] Ha-Joon Chang and Peter Nol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m Economies*, Mst. Martin'Press, 1995

- [56] Ian Jeffries, *Socialist Economics and 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London and New York Press, 1992
- [57]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 "Structural Factor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994 (18)
- [58] James M. Buchanan, *Post-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Edward Elgar Press, 1997
- [59] Joseph E. Stiglitz, *Whither Socialism*, The MIT Press, 1994
- [60] Joseph E. Stiglitz,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resented as the WIDER Annual Lecture, at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 Helsinki (January)
- [61] John E. Roemer, *A Future for Soc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62] Kornai, *Highway and Byways*, MIT Press, 1995
- [63] Kornai, "Makin the Transition to Private Ownership",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0
- [64] Leszek Balcerowicz, "Common Fallacies in The Debate o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Economic Policy*, December 1994
- [65] Laslo Csab,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1996, Vol. 8
- [66] Mark Knell and Christine Rider Edited, *Socialist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Appraisals of Market Mechanism*, Edward Elgar Press, 1992
- [67]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2004 (56)
- [68] Martin Raiser, "Lessons for Whom from Whom?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in China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Transformation*. 1995, vol. 7
- [69] Martba De Melo, Cevdet Deniz, Alan Gelb, and Stoyan Tenev,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The Role of Initial Conditions and Policie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5
- [70] 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Working Paper*, [Http: /www. nber. org/papers/w7616](http://www.nber.org/papers/w7616)
- [71] Olivier Blanchard, *The Economics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72] Pranab K. Bardhan and John E. Roemer Eds, *Market Socialism: The Current Deb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3] Peter Murrel, "Evolution in Economics and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the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in Christopher Clague and Gordon C. Rausser Edited,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92

## The Transition Economics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Zhang Yu*

**Abstract:** Firstly, the history of the transition economics was reviewed, with this theory being divide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paradigms including the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Keynesianism,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 the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the marketism and new left wing. Secondly,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helping to expounding the nature and experience of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form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the choice of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evolutionism vs. structuralism, the local and global aspect vs. order, democracy vs. market, centralization vs. decentralized economy and the role of cultures, etc. Lastl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limitation and prospects of transition economics, as well as the future of Chines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form models in post-transitional period.